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17.02.001

《抚摸岁月》：“双性同体”理想人格的塑造
——何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张毅

(龙岩学院 闽台客家研究院, 福建 龙岩 364012)

摘要: 福建客家女作家何英的《抚摸岁月》是一部反映客家社会风土人情的长篇小说。以“双性同体”理论为主线,从女性主义视角剖析《抚摸岁月》中的母女形象双性同体人格形成的过程,透视母女两人内心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描述在女性意识觉醒的作用下双性人格从母亲到女儿身上的发展变化及两性人格特征在女儿身上的和谐统一,为深入剖析《抚摸岁月》中的女性形象提供新的途径。
关键词: 《抚摸岁月》; 双性同体; 理想人格; 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47.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7)02-0103-06

Ideal personality of “androgyny” in the novel “Touching Years”:
On female images in He Ying’s works

Zhang Yi

(Fujian-Taiwan Hakka Research Institute,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364012, China)

Abstract: “Touching Years” is a novel written by Fujian Hakka woman writer He Ying that reflects the Hakka social customs. With “androgyny” theory as the main line, we analyse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androgynous personality of the main character—mother and daughter images in the “Touching Years” from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The inner 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 in both the mother and the daughter are highlighted. We also depict the evolution of the androgynous personality from the mother to the daughter under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the harmonious unification of the personalities in the daughter, providing a new way of analysing other female images in the novel.
Keywords: “Touching Years”; androgyny; ideal personality in the 21st century; female consciousness

《抚摸岁月》是福建客家女作家何英的长篇小说,全书长达 70 万字,由“我的母亲”“为人之母”“艰难的求学之路”“我的回家之路”“我的进城之路”“我的爷爷”“公公的天堂之路”等 18 个独立的章节组成。全书呈现出“天然去雕饰”之美,以朴素自然的语言,“抚摸往昔的岁月,追思伟大的母亲,品味幸福的人生”^{[1]序},细笔勾勒了一个客家家族几代人的生活轨迹,详尽描述了客家社会的乡土风情,形象细腻地表现了人物命运和内心精神的复杂变化,真实再现了闽西客家农村乃至中国社会近 60 年的沧桑变迁,生动刻画了勤劳善良的客家人,尤其是客家女性在艰苦的环

收稿日期: 2017-01-17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FJ2016B283);龙岩学院闽台客家研究院 2016 年规划课题(LK201608)

作者简介: 张毅(1970-),女,福建福清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女性文学、客家文学。

境中坚忍刻苦、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充分反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审美心理。

何英在《抚摸岁月》中分别成功塑造了客家传统女性和客家现代女性的代表人物形象:母亲和女儿。从弗吉尼亚·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的视角入手,可见何英着力刻画的母女形象不仅具有双性化人格,而且在女性意识觉醒的作用下从母亲到女儿呈现出双性特质的变化发展轨迹,并且两性人格特征在女儿身上最终达到和谐统一。

一、“双性同体”的概念

“双性同体”又称为雌雄同体,英语中的“Hermaphrodite”一词,是指其生物学本意,一般用于表述动植物的雌雄同株或一些罕见的生理畸形者。而它用英文“androgyny”表达时,是希腊文 andro 男性和 gyny 女性叠加而成的词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神话层面使用这个概念。柏拉图认为人类最初是半阴半阳的,所以“双性同体”更多具有了精神和文化意义上性别超越的内蕴。^{[2]126}

心理学上指出每个人的人格中同时兼备强悍和温情、果敢和细致等跨性别特征,并因时顺势而变。分析心理学家荣格(Jung)认为,人类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始模型,即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阿尼玛是男人的灵魂,它是男性的女性特征,是男性无意识中的女性补偿因素;而阿尼姆斯是女性的男性特征,女人也具有潜在的男性本质。^{[3]64}

在文学领域里第一次使用“双性同体”来描绘作家的创作心态和作品的美学风格的是英国女性主义文学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既摒弃了生物学上的涵义,又发挥了心理学上的寓意。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每个人都被两种力量所主宰,一种是男性的,另一种是女性的。在男人的头脑中,男性的力量胜过了女性,而在女人的头脑中,女性的力量战胜了男性。正常又相宜的状态,就是这两者和睦相处,情投意合。”^{[4]109}

根据荣格和伍尔夫的观点来看,每个人的人格气质中都潜藏着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男性身上以男性气质为主,女性气质为辅;女性身上以女性气质为主,男性气质为辅。当一个人的理智和情感随着外界环境的需要随时变化并相互结合

时,即这个人的气质中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达到平衡,阴阳统一,这个人的气质就达到理想的境界。他(她)可以自如地表达情感,与外界的交流沟通就会呈现顺畅和舒适的状态,男女两性才能有效地沟通、和谐地相处,正如伍尔夫所说的“雌雄同体的头脑引起共鸣、易于渗透;感情可以在其间自由流淌、通行无阻。”^{[4]110}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也主张女性应有女性自我意识。女性意识,是女性获得独立的自我价值、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内在动力。它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5]9}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女性意识到身为女性应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生活的主人。所以当女性觉察到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自身所处的地位的不公正、不平等时,女性就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权话语给女性的定义,质疑并反抗男性权力;将“人”和“女人”统一在自己的意识中,关注自身的人生需求,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法国女权运动的先驱西蒙娜·德·波伏瓦认为女人是“正在一个价值世界中寻找价值的人”^{[6]75},女性意识的觉醒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价值追求。

“双性同体”因此成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理论,并于20世纪90年代引起中国文学批评者和创作者的普遍重视。不少评论者和作家不仅运用“双性同体”的创作思维来指引中国文学新的创作方向,也运用它来解读文本中的人物形象、思想主题以及作家创作思想等。何英《抚摸岁月》中塑造的母女形象,展现的女性主体意识、反抗男权话语权威,以及倡导的女性情感精神和谐等都体现了“双性同体”理论的内涵。

二、《抚摸岁月》中的母女形象

客家人由于僻居山区,在封闭的小天地里,一直被传统文化中落后的观念禁锢着:“在我们客家,传统上女人就是不被重视的,而且妇女结婚后,如果生的是女孩子,更是不被人重视。”^{[1]2}因此在客家地区凡是生了女孩的家庭,要么把女孩送人当童养媳,要么随便扔在田头地里让人捡去

当童养媳,然后继续为生男孩奋斗。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女性的个体心灵几乎被女性气质占据,其潜在的男性因素被压抑,呈现出女性主体意识的长眠不醒。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思想的进步,客家女性身上普遍出现双性化的模式,即“一个人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气质的人格(心理)特征,这是一种超越传统的性别分类的、更具积极潜能的理想的人类范型。”^{[7]33}女性个体心灵中男性因素逐渐被激发,女性作为“人”的意识不断增强,她们开始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关注自己的精神需求,期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拥有作为女性的话语权,女性意识逐渐觉醒。

客家作家张胜友先生在《抚摸岁月》的序中称:“我们不由得受到两代主人公的曲折人生的震撼:一个传统的、善良的、受尽磨难的母亲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生活理念;一个山村姑娘对真善美的钟爱,对新的生活的渴望,以及追逐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勇气,可以说,生命的意义得到了升华和释放。特别是从中又极强地感受到作者刚正的性格,疾恶扬善、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同时我们又欣慰地看到作者风雨兼程的人生搏击终成正果,艰苦奋斗赢得的春华秋实。”^{[1]序}张胜友先生对母女形象的评价概括点明了母女的双性化模式的特点,既具有女性的温柔、细腻、体贴、善良、忍耐等女性特征;同时也具有强烈的进取心、事业心和竞争意识,追求事业的成功,像男人一样吃苦耐劳、豁达、坚强等男性特征。只是母女二人,一个是传统女性的代表,一个是现代女性的代表,在双性特质上体现出两性力量的不同程度的存在。其中女儿形象则是“双性同体”理想人格的完美塑造,即两性特征在女儿心灵中处于“正常又相宜的状态,就是这两者和睦相处,情投意合”(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而达到理性的境界。

(一) 母亲:忍辱负重、坚忍不拔

“忍辱负重、坚忍不拔”是张胜友先生对母亲的评价,表达了客家妇女传统形象中的双性化人格气质,其中依旧以女性气质为主,其内在的男性气质得到一定程度的激发。

在母亲身上,女性气质尤为凸显,她勤劳能干、忍辱负重、感性柔和。在抗战期间随着逃难的队伍被卖到福建上杭的养父母家,母亲要承担超乎常规的劳动量,女性气质中的勤劳耐苦在母亲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母亲不仅以弱小的身躯承

担繁重的劳动,还经常挨打挨骂、吃残羹冷炙;不仅经常受到养父母的虐待,还要遭遇大不了她几岁的嫂嫂的欺负。女性气质中的善良温顺、忍辱负重,致使母亲从来骂不还嘴,打不还手,成了逆来顺受的无名之辈。最伤害母亲幼小心灵的是养母嫌母亲倒粪堆的速度不够快,竟然抓住母亲的头发往粪堆里扎,嘴里还骂:“做了半天,还换不到我的一碗粥,叫你吃猪尿、吃猪屎去吧”^{[1]8}。这样的遭遇,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还得忍着不能哭出声,其潜在的阿尼姆斯并未释放,母亲压抑着自己的痛苦和委屈,不敢表达出来。小说中对于母亲忍辱负重的此段描写深刻地揭示了男性气质被压抑,单纯女性气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的悲哀。成家后,姑姑受品行不好、缺儿短女的“高个女人”的挑唆,冤枉母亲和姑丈关系不正当,致使母亲遭受极大的伤害。女性是偏于感性的,事后当母亲面对姑姑的道歉时,女性的感性柔和让母亲忘却了自己所受的委屈,谅解了姑姑。

作为具有双性化人格的传统客家女性的典型代表,母亲个体气质中的男性因素虽被压抑,但依然时有展现。她理智勇敢、坚忍好强、积极乐观。少年时的母亲挑着两箩筐谷子遭遇树丛窜出的野兽,母亲吓得把两箩筐中的谷子撒了一地,但是她咬着牙用手刮起地上的谷子,“哪怕是面对会被老虎吃掉也得挺着”^{[1]7}。在陷入突如其来的险境时,母亲内在的男性气质的勇敢坚忍好强支撑着她勇敢面对险境。在面对“高女人”的长期欺负时,男性气质的理智好强指导母亲选择以端正的品行击退了“高女人”的无端挑衅,最终赢得他人的尊重。在我们家因未缴清“缺粮款”而得不到分配的粮食时,母亲二话不说,将家中正在长膘的生猪宰杀、出售,抵交了“缺粮款”。在面对生活困境时,男性气质的坚忍好强让母亲给孩子们展现了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在遭遇不公、面对生活变故时,母亲的勤劳能干、忍辱负重、坚定勇敢、积极乐观正是客家传统女性形象的真实写照。

(二) 女儿:刚正独立、以德报怨

张胜友先生对身为女儿的作者“刚正的性格,疾恶扬善、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的评价强调了女儿身上更为和谐的两性因素的统一,不仅展现了其内在女性气质“以德报怨”的宽容柔和,更强调其带有男性特征的“刚”,即刚正坚强、吃苦耐劳、独立进取,表现了作为“人”的主体意识中

“疾”和“扬”的情绪的主动表达,展现了客家现代女性勇于表达自我,果敢独立的精神风貌。

女儿的“刚正独立”是作为男性特质的集中反映。女儿理性果断、坚韧刚强、独立进取,其内在的男性气质明显增强。在农村的各项女性的劳作活计中,女儿属于“训练有素”的强劳力,没有人敢与她“叫板”的。“高个女人”对她插下的秧丛找不出碴时,就用语言来羞辱她,她“不与这类女性的败类计较”,但在心里暗暗地下决心:“我一定要让这位臭女人好好地知道什么叫做‘面子’。”^{[1]22}女儿面对劳作和“高女人”的挑衅,所表现出的好强和坚定正是其潜意识中的阿尼姆斯得到了释放和开发,男性气质在年少的女儿身上得到淋漓尽致展现。同时男性气质的坚韧刚强和独立进取又在女儿的求学之路上发挥到了极致。她的求学之路非常艰难,几经挫折,但是她从未放弃,或者以加倍的劳动换取就学的机会,或者坚持学习等待上大学的机会。尤其是在自己妊娠反应强烈时,为了自己未来的出路她咬着牙坚持参加工作劳动和电大的业余学习。孩子出生后,她一肩挑起理家、育儿、学习和工作四副担子,远超负荷。另外男性的理性果断在她处理母亲丧事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得知母亲去世的突如其来的噩耗时,她果断地作出理性判断,努力克制感情,收拾回乡奔丧。在处理母亲后事时,她果断理性地让族亲们简化程序。

同时女儿的“以德报怨”是其女性特质的象征,体现女性的感性宽容。在她生孩子前,母亲卖鸡被人坑了。她虽然认为行骗的人太不道德,却并未生气。她以感恩宽容的心态来面对所经历的不幸,感恩生活,感恩自己的勤奋,表现了女性的感性宽容。女儿和母亲一样是一位任劳任怨、细腻温柔的主妇。她从小懂事勤快,收拾碗筷,带弟妹,拔猪草,下地种田,上山砍柴,既干农活又与母亲分担家务。在她人生奋斗历程中,一边读书,一边带小孩,独立承担家务和工作,坚持学习,支持丈夫的事业。女儿任劳任怨的美德是其女性特质的重要表现。在母亲去世后,她理解丧偶的父亲,强忍着失母之痛劝说弟妹让父亲再婚,关心弟妹各家的生活,体贴丈夫疼爱儿子。她既是孝顺懂事的女儿,又是温和大度的大姐,还是贤良柔情的妻子,以及慈爱温柔的母亲,其感性细腻、温柔体贴的特征彰显了女性气质的柔美。女儿内在的女

性气质与阿尼姆斯和谐地统一于一身,充分展现了客家现代女性“刚柔相济”的典型特征。

(三)从母亲到女儿:觉醒与超越,刚柔相济的理想人格

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出:“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8]199}母亲和女儿都具有双性化人格模式。其中母亲是传统客家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虽有一定程度的男性因素,但女性气质占主导因素,所以当女性意识有所萌芽时,其觉醒的程度是有限的。而女儿内在的双性特征可以因时顺势而变,呈现出和谐共处的状态,所以其女性意识的觉醒更为彻底,体现出现代客家女性形象“刚柔相济”的风采。

由于夜校扫盲班和土改工作队的思想启蒙,母亲的女性意识开始萌芽。她开始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关注自己未来的命运。回首成长经历中倍受养父母的虐待的遭遇,母亲再也不愿受制于他们。于是当母亲在遭遇养父母逼迫和“阿哥”成亲时,“铁了心,不哭、不闹,真有点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概,准备一跳一了百了”,“渴望自强不息自立”,“争取自己的幸福”^{[1]11}。母亲用实际行动向代表父权的养父母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自主意识和真实诉求,她要自己选择婚姻。母亲身上男性气质的理性、坚定、勇敢代替了女性气质的懦弱顺从,终于为自己赢得了自主选择婚姻的机会。

但是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发展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母亲曾有一次特殊的抗议行动,“一想到自己那么多年来,一直不被丈夫当作一回事,还被别人欺负,就劝自己说:‘还留在这里干什么?’”^{[1]35}。于是母亲决定抛夫弃子,出走他乡,追求新生活,但是最后她还是割舍不下孩子,放弃了出走。“出走失败”体现了母亲女性主体意识的不确定性和变化过程,也体现了心灵上两性因素互动的不平衡。首先,母亲自我意识觉醒,心灵的男性气质被激发。母亲在经受公婆的冷遇、父亲的漠视和外人的欺负后,激发起其内在男性气质,由此她对苦难生活所造成的悲剧命运有理性深刻的思考,并果断地作出出走逃离的决定,体现母亲女性意识的觉醒。其次,同样由于女性意识的觉醒,母亲内心母爱、柔情、感性等女性气质在

发挥积极作用。割舍不下孩子,这是母亲作为女性对于女性自身生命体验和人生价值的重视,她尊重自己作为母亲的权力、义务和责任,也尊重自己作为“女人”的情感需求。此外,母亲内在女性气质不仅能发挥积极作用,也会产生消极影响。由于母亲感性、多虑、柔弱的女性气质的束缚,压抑了其内心理性、坚定、果敢的男性气质继续发挥作用,表现出作为“人”的她对于自己不幸命运的妥协,忽略了作为“人”的她对于自身生命价值和人生价值的追求。这是母亲心灵上两性因素互动的不平衡,也是女性在男权话语背景下囿于“人”和“女人”角色的两难选择,最终导致其女性意识觉醒的不彻底,女性主体意识确立的不稳定。

在母亲的双性人格中,由于囿于父权制的长期影响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薄弱,母亲的心灵中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并未进行正常、顺畅的沟通。女性气质得到充分的发挥,而内心的阿尼姆斯大多处于压抑状态,她这位传统客家女性因此无法实现双性人格的平衡与和谐。

母亲的女性意识的觉醒直接表现在对女儿的影响上。母亲因为自己经历童养媳的苦难,明知家里缺劳力,也坚决不再让一群女儿重蹈覆辙。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总是抓紧时机刻苦识字,而且“不能让我的女儿也没有文化”^{[1]461};哪怕困难重重,也支持并鼓励长女上学,为女儿“快要有出息”而高兴,叮嘱女儿要争气。母亲坚信,只要好好培养,自己生的女儿能比过别人家的儿子。对待孩子的命运,母亲说:“人的出生没有办法自己选,但今后的路可以自己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1]181}“一切成果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1]182}女儿在深受母亲女性自我意识的影响下,在时代进步浪潮的氛围推动下,表现出更为自觉的女性意识的发展,呈现出对母亲女性意识的超越。

在对命运把握上,母亲虽然已有女性意识的萌芽,但是囿于时代的局限和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的束缚,她的觉醒是不彻底的,她心灵的男性因素在该发挥作用的时候被淹没。母亲出走的失败,意味着她作为“人”时,并未发挥其内在的理性、坚定、果敢的男性气质去争取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只能在祝福女儿的同时感叹自己的命运:“你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我还得在这里受苦受难。”^{[1]483}这体现了她因自身女性气质的柔弱和

感性而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控。相反地女儿却以坚定的信念、执着的态度、坚强的意志、刚毅的勇气,克服重重困难,充分调动其内在的男性气质,发挥男性气质的优势,坚持自己艰难的求学之路,实现自己对新生活的追求和改变命运的愿望。当女儿看到母亲相信算命以为能活到74岁,可是母亲不到47岁就去世了,所以女儿不相信算命,她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她几次主动争取读书的机会,她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知识能丰富人的头脑,改变封建迷信的思想观念,改变自己的命运。她说:“在我的人生历程中,虽然在校读书甚少,但是社会是一所‘大学’……。成年后,当我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这所‘大学’,我力求自己理性思考,用努力、真诚、感恩、自律,书写了自己的今天并奋笔书写着明天。”^{[1]112}她大胆地表达出自己内心的声音,对自己的命运有理性的认识和思考,这是女儿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和对母亲的超越。

在婚姻关系的处理上,母亲虽然争取到自己选择婚姻的权力,但是,在婚姻家庭中,她还是无力与代表男权话语下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抗争,不仅因为生了一群女儿被公婆、丈夫冷落,在丈夫面前也没有话语权,女儿要上学,丈夫不同意,她也只好忍着;生了儿子,丈夫怀疑是否亲生的,她也忍着……在丈夫和公婆面前她是逆来顺受的,她无力调整自己和丈夫的关系。而女儿则不同,因自幼看到母亲常因“夫妻关系”伤心抹泪,她就特别渴望家庭和睦美满。但她并未以极端的方式对抗男性权力,站在男性的对立面,她注重夫妻关系的平等和谐,凡事商量决定,彼此尊重,互相包容。“坐月子”谁来照顾,孩子如何教育,出差如何协调等等,女儿知道和丈夫沟通时,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该发挥其内在的勤劳、温柔、宽容等女性气质的作用,也知道何时何地何种境况下该调动其内在理性、坚强、果断的男性气质。在家庭关系中,女儿从来没有忽略丈夫的作用;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没有忽略丈夫作为父亲的角色所起的作用。如吴慧敏在《双性同体与宗教》中所言:“双性化者比所谓纯粹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人,有更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关系的协调能力,婚姻家庭更容易和谐。”^{[7]33}

从对命运的把握和夫妻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可以看到,女儿的形象融合了女性的温柔善良和

男性的独立刚强。她完全不同于男权中心文化所规定的被动消极柔弱的女性形象,而是具有了男性一样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的新女性。她头脑中的男性因素和女性因素进行着平等意义上的交融,她既能表达男性所代表的理性和物质现实,又能把握女性所代表的情感与精神世界。她对自己的出路有更清醒的认识,态度、行动比母亲更坚决。在家庭关系中,女儿在追求女性主体意识和自我精神解放的同时,让自己内心的双性气质顺势而发,不仅充分调动其内在的男性气质,而且让其内在的女性气质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避免了因个体女性意识的觉醒造成男女二元对立的局面,保证了家庭和谐的氛围,即“性别之间的敌对主要是个人内部男性和女性成分之间的无意识的斗争的一种投射,两性之间的和谐依赖于个人内部的和谐。”^{[3]64}她从经济上摆脱了依附地位,走出男权中心制的束缚,从家庭小天地走向广阔的

人生社会,体现独立的、自主的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以自身的性别特征优势与内省的方式发现并确立自己的价值,达到自我精神世界的和谐,呈现出“双性同体”的理想人格。

三、结语

何英的《抚摸岁月》通过母女形象客观呈现出的“双性同体”现象,彰显了客家女性对自我主体性的追求;同时,从母亲到女儿形象的发展变化,“所映证的是与时代同行,折射出乐观进取的境界与品格”^{[1]序}。运用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解读《抚摸岁月》中的母女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它有助于我们通过母女女性意识觉醒程度的变化和双性化人格的完美塑造,探寻建构新的性别文化的途径和策略,梳理时代变迁背景下客家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建构和谐的两性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 [1] 何英.抚摸岁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483.
- [2] 梁黎,李林霞.中西异质文化语境下的“阴阳和谐”与“双性同体”[J].中华文化论坛,2015(2):125-130.
- [3] 刘耀中,李以洪.建造灵魂的庙宇——荣格评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64.
- [4]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吴晓雷,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109-110.
- [5] 乔以钢.多彩的旋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9.
- [6]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75.
- [7] 吴惠敏.双性同体与宗教[J].思想战线,2003,29(6):30-34.
- [8]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99.

(责任编辑:许秀清)